

解读马克思机器观的逻辑进程 ——从《哲学的贫困》到《资本论》的文本分析

林美萍, 蔡华杰^①

(福建江夏学院 公共管理系, 福建 福州 350108)

[摘要] 《哲学的贫困》中蒲鲁东以“唯心主义的系列辩证法”为指导阐述了他的机器思想: 一是机器是如何产生的, 二是机器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批判了蒲鲁东, 科学地论述了机器的产生及其与分工的关系, 但对蒲鲁东揭示的机器的坏的方面则是默认的。到创作《资本论》时期, 马克思提出了应将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相区分的思想, 从而解开为何在《哲学的贫困》中对蒲鲁东揭示的机器的坏的方面保持默认态度这一疑团。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对当今国际学术界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 哲学的贫困; 资本论; 机器; 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

[中图分类号] A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0)03-0022-04

在《哲学的贫困》中, 毫无疑问, 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机器观进行了无情的批判, 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述了机器的产生, 机器与分工的关系, 但是, 对蒲鲁东所揭示的机器的破坏作用, 马克思的态度如何?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态度? 《哲学的贫困》之后, 马克思的机器观又有了怎样的深化? 和《哲学的贫困》中的机器观有何不同? 这些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在《哲学的贫困》中, 蒲鲁东仿效黑格尔, “认为现实关系只是一些原理和范畴的化身。……这些原理和范畴过去曾睡在‘无人身的人类理性’的怀抱里”^{[1] 141}, 他把各种经济范畴纳入他主观臆造的发展序列之中, 并根据这种序列把经济进化划分为若干阶段, 每个经济范畴都有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 后一个范畴是历史理性为消除前一个范畴的坏的方面而创造出来的。两卷本的“经济矛盾的体系”就这样建立了起来。

在蒲鲁东看来, 经济进化的第一个阶段是分工, 分工有好的方面, 它促进了财富的增长和劳动者熟练程度的提高, 但是也有坏的方面, 这主要是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 并且制造贫困和文化的贫乏, 二律背反的规律同样驱使着分工, 也就是说, “劳动根据其固有的规律进行分工, 这个规律也是劳动增殖财富的首要条件, 但是劳动分工却导致了否定了自己的目的, 并且自我毁灭了; 换句话说, 没有分工就没有进步, 没有财富, 没有平等, 可是分工的结果却使工人处于从

属地位, 使智力无用武之地, 使财富为害于人, 使平等无从实现。”^{[2] 113-114} 因此, 机器的产生便是这种二律背反的结果, 正是分工的这一内在矛盾才使得经济进化到机器这第二阶段。“社会上新机器的不断出现, 是分工的反题, 即分工的反公式, 这是工业天才对分工和杀人劳动的抗议。机器实际上是什么呢? 机器是把被分工而分割的各部分劳动联结起来的一种方式。任何机器都有这样的特点, 就是把若干项操作合并起来, 简化出传动系统, 压缩劳动量和降低成本。在这一切方面, 机器都是分工的对立物。”^{[2] 148}

在揭示了机器的产生之后, 蒲鲁东又重新陷入了它的二律背反, 指出了机器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好的方面主要有: 一是“使分工劳动者恢复原状, 减轻工人的劳动强度, 降低产品的价格, 活跃各种价值的交流, 促进新发明和提高公众福利”^{[2] 148}; 二是促进才智的均衡化, “劳动在把才能加以区分并且通过行业分工为才能的均衡化做好准备以后, 便依靠机器来把智能彻底武装起来”^{[2] 150}; 三是促进了人类的自由, “机器是人类自由的象征, 是我们驾驭自然的标志, 是我们能力的属性, 是我们权利的表现, 是我们人格的标记”^{[2] 151}。在机器产生的坏的方面, 蒲鲁东认为“机器是产生贫困的一个经常性原因”^{[2] 160}, 并且倘若工人可以幸免贫困, 也难逃地位上的卑微, “这是机器给工人带来的最后一个恶果。因为一部机器和一门大炮一样, 大炮除了长官之外, 还必须配备一批炮手, 机器也需要有一批奴隶来伺候它。”^{[2] 172}

从蒲鲁东对机器的论述来看, 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机

[收稿日期] 2010-03-26

[作者简介] 林美萍(1984-), 女, 福建莆田人, 福建江夏学院公共管理系教师。

^①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器是如何产生的,二是机器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那么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机器观的态度如何呢?

关于机器的产生,针对蒲鲁东的“机器是分工的逻辑反题”,马克思给予了无情的批判,他说:“把机器看做分工的反题,看作使被分散了的劳动重归统一的合题,真是荒谬之极。”^{[1] 165}“劳动的组织和划分视其所拥有的工具而各有不同。手推磨所决定的分工不同于蒸汽磨所决定的分工。因此,先从一般的分工开始,以便随后从分工得出一种特殊的生产工具——机器,这简直是对历史的侮辱。”^{[1] 161}马克思从历史事实出发,指出机器和分工之间是不可分割的关系,一方面,没有分工就没有机器的应用,比如在法国,存在着小块土地制度,没有农业的分工,也没有机器在土地上的应用;另一方面,机器的采用加剧了分工的发展,比如在英国,机器的发明促使工场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织布工人和纺纱工人的分离,以及国际分工的产生。除了澄清机器与分工的关系,马克思还简要概述了从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转变过程,明确指出“真正的机器只是在18世纪末才出现的”^{[1] 166},而机器本身的发展也有一个历史过程,即“简单的工具,工具的积累,合成的工具;仅仅由人作为动力,即由人推动合成的工具,由自然力推动这些工具;机器;有一个发动机的机器体系;有自动发动机的机器体系”^{[1] 165}。

二

如上所述,马克思对蒲鲁东机器是如何产生的问题进行了批判,那么,对蒲鲁东所揭示的机器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这一问题的态度如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态度?这就需要我们整体上把握《哲学的贫困》,分析马克思批判蒲鲁东的聚焦点。

从马克思论述机器的产生来看,笔者认为,马克思主要是批判蒲鲁东的方法,进而批判蒲鲁东机器是“分工的逻辑反题”的观点,阐述机器产生和发展的进程。而对蒲鲁东所揭示的机器的好的方面特别是坏的方面则是默认的。

其实,蒲鲁东在论述机器问题时,他有一个方法论前提,这个前提也是蒲鲁东贯穿其经济进化所有阶段的一条主线,这就是唯心主义的系列辩证法。我们从蒲鲁东探讨机器问题的开篇就可以看出他对这个问题的重视。蒲鲁东在探讨机器时,其实一开始就道出了他的机器思想,即“工业是在与分工规律相对立的过程中采用机器的,目的就像为了重建分工规律严重破坏了的平衡。”^{[2] 145}但是,蒲鲁东并不急于就此展开他的论述,而是笔锋一转,告诉读者“为了正确地评价这种变动的意义,并且掌握它的实质,必须进行一些一般性的思考。”^{[2] 145}在这里,这“一般性的思考”其实就是指蒲鲁东分析机器的方法论前提,在他看来,就是要先掌握方法才能更好地理解他的机器观。紧接下来,蒲鲁东就再次把它的方法论简要叙述了一遍,这一方法论就是“唯心主义的系列辩证法”。蒲鲁东认为,“辩证法就是思想从一个观念前进到另一观念,通过一种更高级的观念而形成系列。”^{[2] 155}蒲鲁东在他的头脑中想象出各种经济范畴的发展序列:分工、机器、竞争、垄断、警察或捐税贸易的平衡、信用、所有权、共有制、人口。这种观念上的发展与现实的发展是一致的,即

现实可以按照这一发展序列分为10个时期。蒲鲁东认为他的这种方法既可避免被人责难为唯物主义者,又可避免被人指责为唯心主义者。其实,蒲鲁东的这些观点就是典型的唯心主义,这在他做完这些“一般性的思考”后,得出的一个结论可以明显看出来,他说:“人类的事实是人类观念的化身;所以,研究社会经济的规律就是创立有关理性规律的理论,就是创立哲学。”^{[2] 147}

既然蒲鲁东对他的方法论前提如此重视,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的时候,其聚焦点当然也就在这上面,这在其后马克思的两次论述上,我们可窥见一斑。一次是1865年1月24日写给约·巴·施韦泽的信《论蒲鲁东》,马克思指明了蒲鲁东所揭示的经济范畴的非历史性:“由于他不是把经济范畴看作历史的、与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而是荒谬地把它看做历来存在的、永恒的观念,这就表明他对科学辩证法的秘密了解得多么肤浅,另一方面又是多么赞同思辨哲学的幻想,而且,他如何拐弯抹角地又回到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立场上去。”^{[3] 1}另一次是1880年3月底马克思写的《关于“哲学的贫困”》一文的引言中,再次道出了同蒲鲁东论战的倾向性问题,他说:“关于这次同蒲鲁东论战的明显的倾向性,还要说几句话。一方面,蒲鲁东攻击正式得到承认的经济学家,如杜诺瓦耶、布朗基院士和‘经济学家杂志’整个集团,然而这不过是迎合了他们的自尊心,同时,又以粗暴的谩骂抨击那些作为现代社会主义的先驱而受马克思尊敬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另一方面,为了给力求阐明社会生产的真实历史发展的、批判的、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扫清道路,必须断然同唯心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决裂,这个唯心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的体现者,就是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蒲鲁东。”^{[4] 1}《哲学的贫困》,我们就可以看出,马克思在论述机器的产生时,就是以唯物史观来批驳蒲鲁东的唯心史观,并得出结论:“机器只是一种生产力。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厂才是社会生产关系,才是经济范畴。”^{[1] 161}

可见,《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的批判焦点集中在蒲鲁东的方法论上,而对于蒲鲁东所揭示的机器的好的方面,尤其是坏的方面,则是一种默认的态度,这也可以从《哲学的贫困》文本中窥见一斑。在批判蒲鲁东时,马克思从三个方面来考察,即“工厂或机器是否真是在分工之后把权威原理带入社会;工厂或机器是不是一方面恢复劳动者的权威,而另一方面又同时使劳动者从属于权威;机器是不是被分割的劳动的新的合成,是不是劳动的分析相对立的劳动的合题。”^{[1] 162}对于第一和第三个方面,马克思都给予了批判,针对第一个方面,马克思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个别企业有计划地生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针对第三个方面,马克思也批判了蒲鲁东,指明机器不是工人本身的各种劳动的组合,不是劳动的合题,而在第二个方面即机器对劳动者的奴役,马克思则不是进行批判,而是基于事实认为:“自动工厂一出现就表现出一些绝非慈善的行为。儿童在皮鞭下面工作;他们成了买卖的对象,有人为弄到儿童而同孤儿院订立了合同。……在每一次多少有一点重要性的新罢

工之后,总要出现一种新机器。而工人则很少在机器的应用中看到他们的权威的恢复,或如蒲鲁东先生所说,他们的复原。因此,在18世纪,工人曾经长期地反抗过正在确立的自动装置的统治。”^{[1]167}在这里,至少可以看出,马克思对机器坏的方面的三方面的认同,一是导致雇主使用童工,童工成为买卖的对象;二是机器异化成资本统治的帮凶;三是由于机器的破坏作用,出现工人反抗机器的现象。

除了《哲学的贫困》中,在随后的《共产党宣言》里,我们也可以看到马克思对机器破坏作用的态度,在批判“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时,马克思再次提到小资产阶级“它确凿地证明了机器和分工的破坏作用”^{[1]297},而马克思对蒲鲁东的定位就是“蒲鲁东先生没有超出小资产者的理想”^{[1]169},所以,笔者认为马克思对蒲鲁东关于机器的坏的方面持一种默认态度。

值得一提的是,笔者使用“默认”这一字眼,而不使用“肯定”这一字眼,是因为“默认”代表的是一种中性的态度,也就是说马克思在这里既没有直接表态是肯定还是否定,而只是道出了机器破坏作用的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现象,而这一现象只要是生活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人都是很容易察觉的,所以,对于蒲鲁东所揭示的机器的破坏作用,马克思是默认的。

然而,马克思毕竟是一位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对于蒲鲁东所揭示的机器的坏的方面,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之后,又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了足以影响当今国际学术界的思想。

三

《哲学的贫困》之后,马克思的机器观主要体现在他的《1861-1863年手稿》,我国将其中的第5本笔记的大部分、第19本笔记的全部和第20本笔记的一部分集结起来于1978年出版了单行本《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除此之外马克思的机器观还集中体现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三章的“机器和大工业”中。

在这些文本里,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对《哲学的贫困》中所阐述的一些机器思想的细化,比如关于机器的产生,马克思阐述了从简单协作时期的通用型工具到工场手工业的专门化工具,最后到机器的产生过程;又如关于机器与分工的关系,马克思谈及了机器怎样消灭某些分工,机器又怎样扩大分工等问题;再如机器的坏的方面,马克思谈及了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的艰辛,资本家为了抵制罢工和抵制提高工资的要求而发明和应用机器,以及工人又是如何反抗机器等等。这些应该说都是对《哲学的贫困》中机器思想的进一步细化,但是,马克思不是止步于此,而是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使得马克思的机器观进一步深化了。

这个问题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和《资本论》“机器和大工业”一章的开篇就提出来了,马克思引用约翰·穆勒的话问道:“值得怀疑的是,一切已有的机械发明,是否减轻了任何人每天的辛劳”^{[5]427}。也就是说,使用机器的目的是为了减轻人的辛劳吗?如果不是,那是基于什么原因使用机器呢?这要从马克思区分机器与工具说起。

当时的数学家和力学家说过,工具是简单的机器,机器

是复杂的工具,有些人甚至把简单的机械力如杠杆、斜面、螺旋、楔等等也叫做机器。马克思对这样的观点给予了批判,他说:“的确,任何机器都是由这些简单的力构成的,不管它怎样改装和组合。但是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这种说明毫无用处,因为其中没有历史的要素。”^{[5]428}在马克思看来,就是要用“历史的要素”考察机器,否则就永远看不到机器的本质,看不到机器与工具的区别。那么,“历史的要素”是什么呢?这就在于机器引起了工业革命,引起了生产方式的变革,正如马克思所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1]142}只有将机器与特定的生产方式联系起来,才能看到机器的本质,也才能弄清楚使用机器的目的何在。这就回到了前面马克思提出的问题,马克思的解答是这样的:“像其他一切发展劳动生产力的方法一样,机器是要使商品便宜,是要缩短工人自己花费的工作日部分,以便延长他无偿地给予资本家的工作日部分。机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5]427}也就是说,只有当机器能为资本家带来剩余价值的时候,资本家才会使用机器,否则就不会使用机器,马克思通过分析指出,“对资本说来,只有在机器的价值和它所代替的劳动力的价值之间存在差额的情况下,机器才会被使用”^{[5]451}。

至此,我们再回到《哲学的贫困》中,正如上面所说,马克思对蒲鲁东所揭示的机器的坏的方面是默认的,马克思并没有进一步分析为什么机器会产生破坏作用,因为此时的马克思还没有写《资本论》,还没有深入研究工人贫困的根源在哪里,正如张一兵所说:“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过渡时期:一方面,马克思彻底摆脱了人本主义哲学构架,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方法中科学地面对历史;另一方面,马克思已经正确地理解了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前提,根本上转变了他对古典经济学的基本认知态度,但还没有直接开始自己独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所以,这使得马克思在这个时期的论著都很自然地存在一种过渡性质。即科学的方法和研究前提与尚没有解决经济学具体理论问题的矛盾性。”^[6]所以,马克思对于作为现象事实的机器的破坏作用,马克思只能采取默认的态度,而没有加以过多的论述。但到了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时期,在揭示了机器的“历史要素”后,我们就可以发现蒲鲁东所揭示的机器的破坏作用,其实并不是机器本身造成的,而是机器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所造成的,即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了机器的破坏作用。

马克思由此提出了要将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的思想。此后,马克思一再告诫工人,“工人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从而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5]493}。所以,工人贫困的原因在于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并且“剩余价值不是来源于资本家用机器所代替的劳动力,而是相反地来源于资本家雇佣来使用机器的劳动力。”^{[5]468}因此,在“机器和大工业”一章中所阐述的“机器生产对工人的直接影响”,马克思不是谈论机器本身怎么引起工人的贫困,而是论述机器怎么被资本家使用,怎么通过延长工作日或缩短必要劳动时间榨取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

余价值, 从而论证工人贫困的真正原因在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

马克思最后的结论是: “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是, 机器本身对于从生活资料中‘游离’出来是没有责任的。……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 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 因为机器就其本身来说缩短劳动时间, 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延长工作日; 因为机器本身减轻劳动, 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提高劳动强度; 因为机器本身是对自然力的胜利, 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 因为机器本身增加生产者的财富, 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 如此等等”^{[5] 508}。

四

从《哲学的贫困》到《资本论》, 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马克思分析机器问题的深入, 《哲学的贫困》主要从机器本身的内在逻辑和发展历史进程进行分析, 比如, 马克思描述机器的发展过程, 此外还有对磨的研究, 考察了磨的历史演变进程, 分析磨的结构和功能改进的内在逻辑等等。这些都有利于还原机器形成发展过程的本来面目, 给予唯心主义者以有力的打击。到《资本论》时期则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对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进行批判, 从而将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这是将机器置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考察, 联系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来考察工人贫困的真正原因, 并且进一步提出解决之道。马克思以《哲学的贫困》中的机器观为基础, 以《资本论》中区分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为终结, 这就是马克思机器观的逻辑演进。马克思对机器的分析在当今国际学术界引起了不同的反响, 在此, 笔者仅以生态危机和科学技术的关系为例。

是机器自身导致了工人的贫困还是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导致了工人的贫困? 同这一问题相类似, 在涉及生态危机的成因时, 国际学术界分为两大阵营, 一是一些环境主义者, 他们认为当今生态危机的原因在于自工业文明以来, 科学技

术的巨大进步一方面积累了财富另一方面却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并且由此从中还分出两个派别——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悲观主义, 前者主张通过技术的改进可以克服生态危机, 后者则相反, 认为科学技术的改进很难解决生态问题, 唯有回到前工业文明时代才行。这一阵营的环境主义者其实都是从技术本身出发谈论生态危机问题, 二者是相通的, 因为“如果的确是技术让我们深陷困境, 则毫无疑问, 出路就在于开发更好的技术”^{[7] 18}。另一个阵营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 他们不同意环境主义者的看法, 认为他们“忽视了驾驭科技发展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尤其是经济结构”^{[7] 26}, 只是抽象地谈论科学技术运用的后果, 问题的关键是应该到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及其所承载的价值观中寻找生态危机的原因, 从而找出解决生态危机的出路, 也就是说不是技术本身引起生态问题, 而是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引起了生态问题。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2] 蒲鲁东. 贫困的哲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8
- [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16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4 31- 32
- [4]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19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3 248
- [5] 马克思. 资本论: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 [6] 张兵. 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的最初接合——普鲁东与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J].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1999(1): 21- 29
- [7] [美] 丹尼尔·A·科尔曼. 生态政治: 建设一个绿色社会[M].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6

The Logical Process of Marx Machine

——the text analysis from 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 to Capital

LN Mei-ping CAI Hua-jie

(Fujian Jiangxia college, Fuzhou 350108 China)

Abstract In 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 Proudhon presented his idea with series of dialectics of idealism for guidance: one is how the machine generates, the other is the good and bad aspects of the machine. Marx used the view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o criticize Proudhon and discussed how the machine generates and its relation with the division of labour. But he accepted the bad aspects of the machine. In Capital Marx came up with that we must distinguish the machine and machine application capitalist so as to decipher in 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 why Proudhon kept defaulted on the bad aspects of the machine. The thought of Marx also produced profound effects on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academics.

Key words 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 Capital machine the capitalist application